国史纪事本末

（1949-1999）

第五卷

二 文化大革命一时期

主编 魏宏运
刘景泉 裴 莘
沈久泉 贾晓慧 撰

辽宁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ZWJC
2003
K27
8

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

第五卷 『文化大革命』时期

刘景泉 裴苹
沈久泉 贾晓慧 撰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国家圖書館藏書

3 0801 5105 7

CHINA

目　录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 1
《五七指示》 …… 6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13
“三家村”冤案 …… 18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 28
“彭、罗、陆、杨”事件 …… 34
工作组事件 …… 40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50
红卫兵运动 …… 59
批判“资反路线” …… 75
上海“秘密抄家案” …… 82
“血统论”与《出身论》 …… 89
“安亭事件”和“康平路事件” …… 99
上海“一月风暴” …… 104
二月抗争 …… 116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 …… 126
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 132
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 142
邓小平在江西 …… 179
陶铸之死 …… 188

CHINA

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 …… 195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周恩来 …… 205
武汉“七二〇”事件 …… 232
“杨、余、傅事件” …… 241
“文艺革命” …… 249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 255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265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272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 278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286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 294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 304
“批陈整风”运动 …… 314
“九一三”事件 …… 324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国民经济 …… 334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347
重返联合国 …… 355
“批林整风”运动 …… 371
中日邦交正常化 …… 389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 404
对外引进的“四三”方案 …… 420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429
“批林批孔”运动 …… 443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发掘 …… 462
“小靳庄经验” …… 473
组阁风波 …… 486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 500

CHINA

评《水浒》运动 …… 522
张志新事件 …… 534
特赦与宽大释放全部战犯 …… 541
反击“右倾翻案风” …… 550
天安门事件 …… 571
朱德逝世 …… 585
唐山大地震 …… 591
毛泽东逝世 …… 609
“四人帮”覆灭 …… 621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641
恢复高考 …… 66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673
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 679
全国科学大会 …… 684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 687
右派分子的摘帽和改正 …… 702
中美建交 …… 705
“大包干”——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 72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Ỉ NÀ

CHINA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60年代中期，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党内外形势，认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要在全党全国横扫牛鬼蛇神，打破常规，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此时，江青认为粉墨登场的时机已到，乘机挤上了政治舞台，做了丑恶的表演。

江青首先和上海的柯庆施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于1965年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这一炮打得并不响，拥护者也不多。1965年11月29日《文汇报》的编者按中说：史学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对姚文元提出了反对的或怀疑的意见。江青深知，要实现个人的野心，必须寻求一个大人物的支持。林彪即是她首选的目标。而同样有政治野心的林彪也想利用江青的特殊地位来实现自己的阴谋。所以，他们一拍即合。召开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会后炮制出笼的《会议纪要》就是他们最初相互勾结的“成果”。

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苏州，以“文艺革命”为题目，请林彪来打所谓“黑线”。22日，林彪就给总政治部下达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

CHINA

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

在林彪的大力支持下，江青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集解放军有关部门的四个负责人，开了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会上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这就是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会后，按照江青的意见写了一个会议纪要，江青不满意，又找了并非军人的陈伯达、张春桥进行反复修改。成稿后，江青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三次修改。3月19日，江青把这份修改后的纪要转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把纪要报送中共中央审批。4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批转给全党全军。

《纪要》中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就是他们的代表论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就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文艺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且为在其他

CHINA

战线上掀起“打倒一切”的极左浪潮提供了依据。“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也有其政治目的。最为要害的是它竟对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无端指责。因此，按照其逻辑的推论就是：既然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中央第一线首先难辞其咎。更确切地说，“黑线专政”虽然说的是文艺路线问题，但实质上指的是政治路线问题。

《纪要》批转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摧毁文艺黑线”的批判运动。这成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并由文艺界发展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军事领域，直至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了。

《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已经互相勾结起来，并开始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乱军篡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值得深思的是，《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林彪在1966年3月22日写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说：“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了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并充分肯定这一文件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

其实，就《纪要》的基本方面来说，是毛泽东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两个批示的继续与发展。他在1963年的批示中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纪要》则发挥说：“毛主席说，他只抓了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毛泽东在1964年的批示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纪要》则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政策），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显然，这两个批示的“左”倾观点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

导致毛泽东对文艺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理解和应有信任的原因、背景比较复杂，一是对于反右派斗争中的严重扩大化，全党在长时间内没有将其视为错误。而“右派分子”中以文艺界的同志和一般知识分子居多，党内一 些同志就对这些产生偏见，把他们视为异己力量；二是这些同志和工人、农民有所不同，他们的职业决定了其要在银幕上、舞台上、讲台上、作品里无可回避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见解与“左”倾的东西相违背，常被视为“右倾”；三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本来不足为怪，但因其消极影响而把它夸大和上纲。以后，“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就认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会见法国马尔罗时，就指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中的一部分属于修正主义阶层。

可以认为，《纪要》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界状况的严重错误估计，这种估计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主要论点之一，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并把它推向

CHINA

了极端，从而作乱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正式决定撤销这个完全错误而且颠倒是非的《纪要》。

CHINA

《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由林彪转来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 1966 年 5 月 7 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指示》勾画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并且提出了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指示》可以被看做是探索毛泽东晚年错误之源的一把钥匙。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60 年代中苏大论战的深层次焦点，就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此有独特的见解。他理想中有一个“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以此为标准衡量苏联等国家，认为它们变修了。同时判断国内的许多做法也是修正主义的。更为严重的是，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就在毛泽东做出这个《指示》的同时，已经在

CHINA

设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来解决他认为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且是自以为发现了真理。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社会主义的模式中，《指示》则反映了这个模式的大致轮廓。

《指示》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如同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一样，“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这样，“军事、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在此基础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景象是，每个地区、每个行业基本上是“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存在；每个成员是既会做工，又会种地，还会打仗的多面手，人们过着很少有社会弊端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指示》中说：“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指示》在结尾中进一步指出：“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革命战争时期所创造的经验是怀有深厚情感的，特别是当他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一些弊病时，更加怀念战争时期那种“实行供给制，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革命气氛浓厚”的生活情景。他曾经说：“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CHINA

以上这些话说明，他的一些设想来源于他把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某些成功经验绝对化了。正如胡绳同志所说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性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了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际上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这个分析是非常深刻的。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正式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看似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个大家都一样的"大学校"里，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好像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对于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无论是"五七指示"还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却一句也没说。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其实，关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现代化大生产。列

CHINA

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惟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历史上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并能巩固和发展，决定的因素就是资本主义创造了远远超过封建主义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也要靠制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比资本主义更丰富、更优秀的社会产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协作愈来愈广，生产愈来愈有社会性。那种"小而全"和战争年代"军学、军农、军工、军民"的简单社会分工，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很早就已经开始探索了。在 1956 年 11 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种看法，当时的党中央是逐步接受的。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影响等复杂原因，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而且，他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从党外到党内，从基层到上层开展阶级斗争。《指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军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也就是要用开展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在他修改定稿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讲得十分清楚：从 1957 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 1959 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心问题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去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

CHINA

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被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因此，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只能损害社会主义事业。此外，党内的分歧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因为党内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对许多事情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党内难免出现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是属于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的不同意见，并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应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求得正确解决。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必然会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重大的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包括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对于这些“痕迹”，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并逐步加以解决。例如，对于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必须根据生产力的状况及发展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总之，对于事实上存在的一些社会上不合理现象，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惟有如此，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指示》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把钥匙，因为它勾画出的那幅“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虽然不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科学答案”，而恰恰是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左”的错误的根源所在。

新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

CHINA

义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而《指示》便是对他这一构想所作的系统表达。正是在他所构想的这个“左”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支配下，他从 50 年代末开始，一步一步地在“左”的道路上迈进。可以说，毛泽东晚年的许多错误都直接导源于这一模式。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显然是从这个“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宽。从反右派、反右倾，到社教运动以及过火的文化界的批判斗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从“炮打司令部”到支持“全面夺权”，“横扫一切”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什么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看得如此严重？为什么对几十年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战友又一个个不信任了呢？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可以从毛泽东头脑中的“左”的模式找到答案。大跃进期间，全党上下都在按毛泽东构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共同奋斗。遭到挫折后，党中央在实践中积极寻求新的道路。毛泽东虽然同意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但并没有放弃“大跃进”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同党中央集体之间深刻的意见分歧，而他把这种分歧看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并逐步形成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两个司令部”的概念。为了坚持他自认为正确的模式，他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他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其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他当时以“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来对照现实，错误地估计了他与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分歧的性质，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于是深深地陷入了“党变修”、“国变色”的忧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